

我的父亲连士升

连亮思

一、连姓渊源

我的父亲连士升出生于1907年5月24日。他的家乡在中国福建省福宁府福安县(今为福安市隶属于宁德市)。连姓已有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根据考证,我们的始祖是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齐国大夫连称,而他的后人向外迁徙前是留守在山西太行山的上党,史家称为连族“上党开宗”。在福安的连姓家谱能追溯到南宋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到了我们这代已是第24世。

父亲的先世务农。我的高祖父在科举稍露头角,于是就从乡下搬到城里。曾祖父和祖父也继续举业。在贫困的农村,能读书识字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族人都夸耀父亲来自“书香之家”。

二、教育经历

父亲自幼聪颖好学,我的祖父是他的启蒙老师。祖父绶昌公是邻县穆阳同文小学的国文老师,父亲也跟着他到穆阳上小学。不幸的是,父亲8岁那年,祖父去世了。他死时,家徒四壁,家中只有11块大洋和几亩薄田。茫茫人海,父亲和我的祖母,孤儿老母,相依为命。

祖父丧事过后,父亲就转到福安第一小学直到小学毕业。因没有机会升学,他只能在私塾学习古文。《四书》《左传》《诗经》《幼学琼林》《千家诗》《东莱博议》等,读了三五遍,就能背诵,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基础,练习写诗作文。每当父亲回忆起这段暗淡的日子,他感慨地说,没想到他最终是凭他在人生的低谷所得到的学问来谋生。这是指他一生是靠写得一手好文章得以安身立命。

父亲15岁时,他的母亲去世了。没有了赡养母亲的责任,他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到城市升中学。他认为要赶上大时代,必须学习英文。得到乡亲的资助,他选择到霞浦圣公会办的作元汉英学校,在那里他得到爱尔兰校长邱约翰牧师(John Curtis)亲自指导,用心地学习《圣经》和莎士比亚的多部名著及欧美近代史,为他的英文打下扎实的基础。在作元学校毕业后,父亲到福州最有名的教会学校英华斋读书。到了1927年,由学校保送他进入北京的燕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于1931年获得经济学学士。我在2016年底和家人到福安祭祖时,在连氏宗祠看到高挂在堂上的“连士升硕士”匾额,才知道他曾获得硕士学位。

三、动荡人生

父亲认为他一生最快乐而值得怀念的生活是他20到30岁之间，在人文荟萃的北京的日子。在燕京大学期间，他结交了许多良师益友。大学毕业后，他得到顾颉刚老师的推荐获得国立北京图书馆的研究席位。他在《回首四十年》中说道：“假如燕京大学给我以结交几个师友的机会，那么北京图书馆可以说给我带上治学的门径。”

大学毕业后，他除了继续在图书馆钻研，也靠写稿赚钱。从我们手头上的资料，知道他所撰写和翻译的有关经济学的文章，经常刊登在当时的《禹贡》半月刊，《食货》半月刊，《东方杂志》《大众知识》等刊物。他于1932年和燕大历史系才女郑侃媿结婚，两个文人过着清苦却充实的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3岁的女儿仓促逃难到香港。好不容易在《港报》找到一份工作，不料几个月后，报社收盘。1938年郑女士在战乱中过度劳累，心脏衰竭，不幸与世长辞。

1938年秋，父亲在香港“国际通讯社”服务，他的文章发表于香港出版的《国际周报》《华侨先锋》《国际通讯》等刊物。同时他也在岭南大学教授经济史。那时，广州岭南大学已经搬到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校舍，每晚继续办学。在香港期间，父亲通过他大学同学罗牧先生的介绍，与他的胞妹罗梅结婚。我母亲告诉我，他们的证婚人是许地山先生。

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12月7日爆发，香港英军在当年的圣诞节投降。在港的知识份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替日本工作，要么就得马上离开。于是父母带着大姐和不满周岁的我和大舅罗牧一家及戴淮清伯伯一家共14口，开始逃难，几经辗转，到了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邻近的茶荣县（现为茶荣市，Thành phố Trà Vinh）避难。在越南隐居期间，父亲当起福建小学校长，教导自己的孩子和当地的华裔学生，也继续翻译剑桥大学克拉潘教授（J. H. Clapham）的《现代法德经济史》《近代英国经济史》。在父母的呵护下，我度过快乐的童年。

1948年，父亲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商报》，同年代表报社到巴黎采访联合国开会的新闻。那次出国之后，他为《南洋商报》丛书出版了四部日记，后编成《欧洲纪行》。此后，他一直在《南洋商报》当主笔，副刊编辑，总编辑，直到1971年退休为止。

四、最后旅程

1973年4月1日父亲乘坐国泰航空，经过香港到中国去。我大姐到广州接他。那次旅游的目的原本是先要回福安祭祖，再拜访他的老师和同学。可惜当时到福安的交通非常不方便，无法安排，尽管他感到非常遗憾，也只好作罢。从他当年寄回的家书，知道他于4月29日在北京和他阔别36年的顾颉刚老师，燕大老同学吴世昌、翁独健及我大姐，罗元舅舅家人一起吃北京烤鸭。他也几次和他燕大的室友齐思和及家人会面叙旧。

父亲在中国游历了两个多月，大姐一路十分细心地照顾他。他重游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广州，香港，沿途他勤写日记，准备把那次的经历写本书，书名已定为《六城记》（后来，1977年，

我随新加坡医学会到中国访问兼旅游，回来后把我的见闻出版了一本单行本，书名就采用先父原本想写《六城记》以纪念他)。不料他6月24日回到新加坡后，可能旅途中太过兴奋又疲劳，隔天就进医院检查并留医。我们，包括父亲自己，都没想到那次的中国之旅，竟然是他人生最后的旅行。我亲爱的父亲，于1973年7月9日晚上，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很安详的逝世。享年66岁。

五、博大胸怀

父亲学贯中西，为人谦逊，爱护家人，关心朋友，提携后进，从不为名利所诱。他出生在民不聊生的年代，一个毫无家庭背景来自穷乡僻壤的孩子，要走出农村，崭露头角，得靠自律、努力和毅力。父亲始终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力求在逆境中求胜！他认为“塞翁失马”让人从不绝望，而“愚公移山”教人持之以恒，这两句道理浅显的成语，拯救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自强不息，永远屹立不倒。

父亲先天不足，经年累月的奔波、忧虑，虽然精神始终处于高能量状态，身体却疲惫不堪。除了日常工作，每天必定挤出固定的时间有系统的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他青年时期在福州得过痲疾。在北京得过大肠瘤，把大肠切除了一段。1956年他受印度政府邀请到印度访问后，患上黄疸病，不久又得了糖尿病。1966年得了心脏病，以后就成为医院的住院常客。这情形换作旁人，大多数会放慢脚步，采取悠闲的步伐过日子。可是我父亲永远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健康，也幸亏我母亲平日在饮食方面，给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好几次他都能从死亡边缘起死回生。他期盼退休后能专心写作，为此他为自己制订了详细的研究和写作计划。

除了报馆的工作，我父亲非常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他曾多年担任南洋学会会长，中国学会副会长。我记得他经常要亲自向一些经商的朋友求助，请他们慷慨出钱支持学会的出版和各项活动。在他担任会长的期间，因资金来源有着落，学会也能够举办较多精彩的活动。他也曾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也曾是新加坡大学董事会委员。

1961年，新加坡政府委任父亲为公共服务委员会委会。委员会是为政府部门挑选适当的公务员并决定政府官员的升迁。当时父亲是委员会中，唯一通晓中文的人。他对那些英语讲得不大流利来自中文源流大学的应征者，总是特别关照，尽量让他们有机会发挥其它的优点，以弥补他们在语言表达方面的不足。1963年政府颁发公共服务奖章以表彰他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六、笔耕不休

我记得有一位新加坡的教授曾经问过我，在文学上如何为父亲连士升定位？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一位中文作家。他的代表作是八本散文集《海滨寄简》，和三本印度三杰传记—《泰戈尔传》《甘地传》和《尼赫鲁传》。他文字简练，情感真挚，思想深刻，立场公允，态度温和，每篇文章都能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引起读者共鸣。

父亲1948年到新加坡定居，接下来的二十几年，政治依旧动荡不安。星洲自1819年被英国人占为

殖民地，到1959年争取为自治邦，后来在1963年成为马来西亚的成员，1965年又一夜间忽然独立。这期间中文报纸主笔的任务之一是成为人民的喉舌，换句话说就是要下情上达。与此同时，作为公众媒体也必须和政府合作，就是要上情下达。要把这两面经常对峙立场的工作处理得恰到好处，必定要有智慧和公正客观的分析能力。我父亲认为写社论是责任，是应时之作，所以他不认为他写的社论是值得保留的。其实他的社论有许多前瞻性的意见，譬如抑富济贫，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警惕军国主义复燃的日本、绿色革命、缩短城乡的距离、双语教育的重要、南洋文人的使命等，这些5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议题，至今还是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因此，我们选出他写的一部分社论，几年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连士升社评选集《慧眼静观》和《卓识思远》。

八部《海滨寄简》以《物华集》《天宝集》《人杰集》《地灵集》《落霞集》《孤鹜集》《秋水集》《长天集》命名。每一集48篇，是散文体的书信集。第一篇写于1958年，最后一篇完成于1972年，总共跨越14年的时间。那个时代的人，最常用的通讯方式是邮件。我记得父亲每天收到许多来自各地的朋友和读者的信件。回信是一件大家都嫌麻烦的事，父亲也不例外。他的读者很多是在学的青年，向他请教学习和做人的道理。他爱护青年如同自己的子女，所以他把平日教导孩子们的话，以信件的方式和读者分享，一箭双雕。

父亲十分好客，家里常有客人来访。事隔多年，我们才知道家中的客人“往来无白丁”，尤其是他远方的朋友很多是名副其实的“鸿儒”。所以父亲的《海滨寄简》的收信人一概不署名，以免标榜的嫌疑。他的书信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喜恶。他痛恨战争，厌恶政客，敬佩学者和伟人。好书令他兴奋，彻夜难眠。他每每陶醉于优雅的古典音乐中，而气势恢弘的绘画或飘逸洒脱的书法更是让他不忍释手。他尤其喜欢色香味俱佳的美食，我母亲因为要应付父亲常常在家请客的习惯，也练出一手好厨艺。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父亲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身份要研究印度的三大伟人？我们在《尼赫鲁传·自序》中看到这段话：

自少时研读《史通》及《文史通义》后，三十多年来，我一直笃信“史才、史学、史识”的学说。的确，“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尼赫鲁是个文质彬彬的人，他有见识、有学问、有文采，在当代学人中，仅有英国的罗素可以和他媲美。

他认为尼赫鲁的英文造诣极深。虽然政治上的是非随时随刻在变化，文学和艺术却是万古长春。尼赫鲁的三部名著——《世界史一瞥》《印度的发现》《自传》——只要英文存在的一天，自有永久流传的价值。

这其中还有当年时事的考量。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举行。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亚非国家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举行的国际会议，讨论了第三世界不结盟，求同存异，保卫世界和平的方针。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不顾许多国家反对，坚决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接下来的多年，中印关系非常良好。

除此之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要提及中国或与中国文化有关的问题，都会有人马上给你贴上标签，惹上许多麻烦。当时中国出版的书籍，除了一些古籍，在新加坡很难找到。怪不得父亲买的和看的多数是英文书。因此，研究印度问题比较容易找到资料，可以就事论事，不会受到太多的政治

因素干扰。

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连士升文集》，除了上述两套书，还收集了大部分父亲出版过的散文和游记。至于他的日记，及许多没有收录在这五卷的文章，还有待整理。

我记得父亲常说生命有没有价值，就是看你每一天怎样利用你的时间。他坚信累积的力量。他每天早睡，又比别人起得早。在万籁俱寂的环境，独自在灯下看书，思考。到了早上大约十点钟，他会带着他的书、稿纸，连同全麦面包、一个苹果，慢慢步行到附近的海景酒店。一路上，他时常会用家乡话吟唱古诗。他喜欢听海浪的声音，面对无垠的大海，大自然赋予他修复的力量。当他打好腹稿，文思源源而来，多篇佳作，一气呵成，绝少涂改。他这种律己以严，待人以宽的态度，也成为我们一家人处事的榜样。

结语

我父母那代人，生活在战乱中，从来没有旅行的乐趣，只有逃难的痛苦，能够安全地带大孩子已算万分幸运，当时根本没有“移民”的概念。父亲最后到新加坡定居，其实也不是他的原意。时局千变万化，在新加坡独立后，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新加坡公民。

父亲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中华学者，具有温文尔雅的儒者风范。他自始至终心系中国，对故土，家乡，同学、师友总是念念不忘。当他成为新加坡公民后，他全心全意地效忠国家，为新加坡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父亲的一生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典范。

父亲生前特别关爱思想纯真，埋头苦干的年轻人。我们家人，好友及许多他的忠实读者，于2007年，父亲100周年诞辰纪念时，在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当时的院长——许福吉博士的促成下，成立了“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以促进新加坡的华文活动。

眨眼之间，基金会已成立了14年，现由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在负责管理。我们喜见几位才识渊博的学者筹办具有国际水平的《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学报》。出版有分量的学报是父亲生前非常想做的事。他的梦想，竟然在他去世将近50年后终于实现，相信他在天之灵，必定非常欣慰。